

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19.09.005

理据回旋:身体的自然表意与诚信建构¹⁾

饶广祥 喻娴婷

摘要 身体参与表意的现象早有人关注,有关社会身体文本表意的讨论也颇多,但对身体的自然手段表意(本文简称为身体自然表意)的讨论却不多。身体自然表意的本质问题是诚信。诚信是文本表现出来的真实感,是人际交往的先决条件。后真相时代,真实问题掩藏在诸多的舆论观点中,诚信问题凸显并成为重要的研究话题。身体参与沟通时,其物理在场性具有“自然”的真实性,呈现自洽的“理据性”(motivation),常被认为是诚信与真实的(gives off),因此身体是诚信建构基点,其所卷入的诚信问题是传播学研究的基础问题。本文基于符号学的方法,以沿街乞讨的典型文本,试图讨论人际传播中诚信的身体建构问题。身体表意若要诚信,得处理“理据性”问题,即身体和意义直链接的“天然”问题,这种链接受接收场景的影响,呈现出“回旋”的机制。乞讨中的身体,要构建出“凄惨值得帮助”的意义,主要依靠身体来表达。大多乞丐表达首先通过凸显“残缺”,获得标出性理据性,从而建立诚信表意的基础,但若要求行人的帮助,需要通过加大身体的卷入,强化理据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身体的可展演部分,乞讨人员往往会降低身体卷入,弱化理据性,以降低展演的意义冲击先前强化的意义。这种理据回旋的掌控,表明身体作为传播的“自然”在场,具有“伪自然”性,也说明身体表意研究作为传播组成部分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 诚信;身体;理据性;沿街乞讨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饶广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四川成都610041;喻娴婷,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符号学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41

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人际传播中,身体如何参与建构诚信。身体是传播表意的基点,诚信则是沟通双方愿意进行交流的基础,身体如何建构诚信,是整个传播学研究的基础问题。必须强调的是,诚信建构问题与身体表意问题都虽然不是新问题,但本文所关注的诚信问题,是意义的“真值可信”问题,不是真实问题。本文所探讨的身体表意,与戈夫曼等关注的身体表演、与语言学关注的微表情都不一样,本文关注的是身体的“自然表意”,即无法操演部分的表意问题。身体被认为是物理与信息的结合体(刘海龙),是生理身体与交往性身体联合体(奥尼尔)。身体表意的独特性在于通过身体的物理状态及其改变来表达意义。身体作为表意系统,包括了无法操演的物理身体部分、可操演的身体部分。这种身体操演与意义的变化,呈现出一种理据性变动的关系。大多数身体表意研究更偏向于文本性或交往性身体部分(可操演部分),对这种理据性不够重视。理据性让身体表达和意义之间呈现出关联性,也呈现出

1)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全球传播时代商品符号学的发展研究”(skqy201611)。

一定的“可信值”，这也是为什么要研究身体和诚信问题的逻辑所在。为此，本文研究的身体表意，和戈夫曼等人的研究的最大区别在于，本文强调的是沟通者如何通过操作理据性，参加表意，建构诚信。

为了研究这个选题，笔者长期驻守于各大人流密集区，有意识地寻找并观察沿街乞讨的人群，包括成都与南昌的各个步行街、火车站、汽车客运站等，并以做笔记、拍照、访谈的形式进行数据收集，观察他们的动作、表情，聆听他们的讲述，同时观察周围人群的感官体验、行为反应并进行分析。同时观察、记录和分析沿街乞讨的人群受到施舍的具体情况（如频率、情态、金额等）。除此之外，笔者还对一些沿街乞讨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度访谈，力求还原其真实情况。

一、身体自然表意与理据性问题

身体表意问题漫长的讨论，但更多聚焦在身体展演部分的讨论。奥尼尔使用了社会身体文本（sociotext）、“交往身体”（communicative bodily presence）来讨论身体的表意，

并讨论了“我们如何能借助于身体来重构社会机制”。^[1]戈夫曼创造了“身体修饰”（body gloss）这个词，讨论身体的展演问题，关注仪式化身体。^[2]莫里斯·梅洛-庞蒂将身体的表意性说的更直接：“身体的自然手段最终难以获得所需的意义；这时它就必须为自己制造出一种工具，并藉此在自己的周围设计出一个文化世界。”^[3]

奥尼尔和梅洛-庞蒂指出了身体表意的一个核心区分：身体的自然手段表意与身体社会文本表意。有关身体社会文本表意的研究非常多，但有关身体的自然手段表意的研究却不常见。身体作为一个物理实存，进入文化时，便参与了表意，随着身体展演程度的加强，身体表意的程度

也不断加强。从物理身体到文本身体，身体表意是意义逐步叠加的过程。身体作为表意文本，和语言等表意文本的重要差别在于身体表意是“物理-文本”二联体。福柯认为这种二联体存在着“转换点”，这种转换点，用梅洛-庞蒂和奥尼尔的术语，链接的是身体“自然手段表意”和“社会身体文本”表意。

因此，身体表意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身体的展演。尤其是表情和动作的展演，是身体表意的最直接的途径，可以充分表达喜怒哀乐等情绪意义。第二，身体的自然表意，即身体的物理状态的意义表达，不受人的主观展演的意义。这也是梅洛-庞蒂所强调的“身体的自然手段”。比如身体的一些无法改变的物理因素，如身高、肤色等；也包括一些难以展演的部分，比如微表情。微表情往往被认为是真实情感的流露，被认为是表情真实与否的判断依据。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身体的展演性两分有时也会变动。身体物理状态的调整，诸如健身、整形美容等，也是身体操演的一部分。这种看似纯物理的调整，不少也是基于表意的需要，也属于这部分。

身体表意的这个两个分类，戈夫曼也提到过，戈夫曼认为，“流露”（gives off）才是判断表演可信与否的标准，而“给予”（gives）本质上是一种表演。^[4]身体的表意性根据展演程度，呈现出从理据性到任意武断性过渡的路线。身体表意和其它表意的最大区别在于，身体是以在场的方式来表达意义。这类似于图像以相似的方式来表达对象，呈现出天然的“合法性”（巴尔特），这也是“有图有真相”说法的根据所在，所以“我们一般径直把外表视为真实”^[5]，但身体和图像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身体的不是完全的理据性，有不少身体展演，具有强烈的任意武断性。

身体的意义和身体的物理属性之间，呈现出

[1]奥尼尔·约翰. 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6:5.

[2]GOFFMAN E.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128.

[3]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 Colin Smith (London: Routledge & Regan Paul, 1962, p. 146, 本文转自:约翰·奥尼尔. 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6:4.

[4]戈夫曼·欧文.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2.

[5]奥尼尔·约翰. 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6:导言10.

直接的、硬性的关系,这也就是“理据性”问题。俗话说,身体是不会说谎的。这句话就证明身体具有“理据性”。理据性是符号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指符号与对象之间非任意武断的联系。索绪尔把“任意武断性”的反面称作“理据性”(motivation),他认为符号与意义之间没有理据。皮尔斯没有用理据性这个术语,他的理论体系却立足于理据。^[1]例如,皮尔斯认为像似符号和指示符号是具有理据性的符号,这是由其意义连接方式所决定的,身体的理据性作用也是如此,人们看见身体残疾的乞讨者,便会在脑中建构出一个残缺可怜的先存形象,也就顺理成章地承认其是“诚信”的。换句话说,自我意识介入的程度越低,理据性就越强。身体是在场的表意,身体作为中间因素连接了真实与诚信,身体是真实与诚信之间的纽带。因而,身体在诚信建构中具有相当突出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从身体视角研究诚信问题可以更为触及人际交往的本质。

身体的理据性呈现出某种“天然真实性”,是人际传播沟通中的诚信构建的重要手段。真实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逃不开的问题,但在后真相时代,“真实”问题在单个的文本之中体现为“真知”问题,也就是公众对于文本诚信的判断问题。2016年11月,英国《牛津词典》公布了2016年年度词汇——“后真相”(post-truth),意为“陈述客观事实对民意的影响力弱于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的情况”。^[2]换言之,个人信念和情感都解释社群期待的“真实”,这种认识容易被文本操纵,表现为文本的诚信,相对于自由发散与发展的意见和观点,事实本身的真实性反而居于其次,这些意见和观点往往建立在人们更为本能和情绪化的信任立场上。因而,后真相时代,学界对真实的研究事实上更多的转向了对诚信的研究。

“诚信”的定义目前在国内学界的观点不一。此次研究中所说的“诚信”是指发出者在文本中

建构且被接收者信任的情况。虽然说诚信与信任的定义有着一定程度的交叉,但二者的确存在着诸多差异:诚信更多的是形容一个人或者说单个文本所具有的品质,而信任更多的是在固有的印象或经验下人们做出的顺应行为——这就存在着发出者与接收者的偏重性以及时间长短的不同。简单来说,诚信可以是短期的、通过文本即刻得出的;信任则是长期的,需要多种先在因素共同作用才能形成。故诚信与否可以通过单独的文本进行解读,而信任则是长期关系的建构,应当考虑更为复杂的条件。

诚信与真实存在的差异更大,虽然一般而言诚信和真实呈正向相关的关系,但是二者的主客观差异十分显著。具体而言,诚信可以是主观的、通过文本建构的;而真实则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如前面所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后真相时代,真实问题向诚信问题的转变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正如赵毅衡所说:“符号表意的目的是传达交流,传达可以出自诚意,也可以出自谎言意图,但是在发送与接受之间隔着符号文本,文本遮蔽发送意图。……诚信与谎言,成为现代跨学科的意义研究中一个始终没有能理清清楚的难题。”^[3]因此,在当今时代,讨论对于诚信的判断以及如何建构诚信的机制具有相当的研究意义。

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距离加速拓展的今天,身体的在场成为保证交流诚信的基本前提之一,身体符号的投入在诚信建构中的作用相比其他媒介而言更加明显。刘海龙认为身体问题的突出,正是由于人类在新媒体时代感受到了无尽的空虚,同时身体卷入在沟通中的重要性进一步下降,人们急需一些事实来证明自己(或者说身体本身)的重要性。^[4]身体在传播中的作用毋庸置疑,甚至可以说身体问题关乎人类传播的本质,然而,由于现实原因和技术发展等情况下身体的

[1]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75.

[2]环球网.牛津词典2016年度词:“后真相”[EB/OL].<http://w.huanqiu.com/r/MV8wXzk2OTY5NjVfMTM0XzE0Nzk0MzA2NjY=>.

[3]赵毅衡.诚信与谎言之外:符号表意的“接受原则”[J].文艺研究,2010(1):27-36.

[4]刘海龙.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J].国际新闻界,2018(2):38-46.

作用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其缺位的现状也同样不容忽视。而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寻求身体对于人际传播中诚信建构的效用,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人体是综合的文化载体和导体,身体与媒介相统一,交往、交流和传播永远不能把身体排除在外。^[1]身体通过理据性建构诚信,这是前面已经讨论的话题,但其中的机制在哪里,则是接下来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不管是身体还是其他的传播方式,毫无疑问都带有一定的隐藏意图,但是身体的理据性仍能比较清楚地区分,赵建国将身体分为“动作”、“表情”、“语言”三个层面,^[2]前两个层面都是属于身体的范畴。此外,在此基础上加入“肢体”这一层面,这是由其在人际交往中具有的不言自明的真实性决定的,肢体可以说是身体中理据性最强的存在,在此也作为参照的标准进行探讨。以上四个层级按理据性由强到弱的排序得出“肢体→动作→表情→语言”的顺序,这是由于身体在其中的作用偏向得来的。换句话说,理据性的凸显程度越高,其通过身体进行的诚信建构就越成功。例如全身瘫痪的乞讨者,虽然没有办法用语言或动作表达自己的悲惨,但由于其瘫痪的客观现实展现出来具有相当的自洽性,因而其诚信程度反而达到极端的高度。那么,理据性如何运用于身体建构诚信的过程之中?下文将详细进行论述。

二、展示窄幅身体,凸显标出性理据性

身体的自然表意,首先是身体给人的整体印象。身体作为一个文本,有各种符号组成。有些符号,比如发型,可以不断变化,呈现出宽幅的特征。有些表意元素,难以变换,呈现出窄幅的特征,如体型、身高、脖子长短等。越是难以替换的窄幅符号,具有更强的理据性,表意的意义越容易为人所信。凸显出最具理据性的部分,是成功建构的首要手段。这些符号会成为整体身体自

然表意中的“标出性”符号。俄国学者特鲁别茨柯伊(Nikolai Trubetzkoy)提出了“标出性”的概念,到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已经意识到标出性并不局限于语音、语法等,而且进入“美学与社会研究领域”。赵毅衡指出:“当对立的两项不对称,出现次数较少的一项,就是‘标出项’(the marked),而对立的使用较多的一项,就是‘非标出项’(the unmarked)。”^[3]理据性存在着标出和标出两个部分,而人际传播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形成理据性通过自我意识的标出。而身体残缺则是沿街乞讨的文本最为理据性的一面,通过展示、凸显自身肢体的缺陷,达到自我标出的效果,从而引起行人的注意乃至建构诚信。在沿街乞讨的文本调查中,笔者发现如今乞讨者较之以往的展现方式,更加注重外观和动作中给人们带来的视觉效果,以凸显残疾的身体部位和明确表意的动作为主,以此来引起他人的同情和怜悯,进而获取信任。相对于摆放在乞讨者身前的文字说明或音乐的播放,以身体展示带来的观感能够直观地获取行人的信任,建构单个文本中的诚信,并获得施舍。总而言之,大多数的乞讨者均凸显了身体的理据性,其核心就是身体的残缺部位,以期接收者构建出真实的表达。此处的凸显行为即自我意识建构的“标出”,即先通过展示身体残缺的部分标出吸引他人的注意,再通过其中蕴含的理据性建构自身的诚信,这是一个连续有效过程。



图1 火车站的半身瘫痪者



图2 残联院门口的手指残疾者

[1]赵建国. 传播学视野下的人的身体[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3(12):11-16.

[2]赵建国. 实体传播与传播分类探讨[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9(4):92-96.

[3]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275.

如上,成都火车北站的瘫痪乞讨者(图1)以及成都文殊院的手指残疾乞讨者(图2),为了让行人相信自己的乞讨说辞,他们往往不会故意遮挡自身的身体缺陷之处,反而是通过动作、道具将其重点凸显出来,即建构标出理据性。比如图1的下身瘫痪者就利用轮椅的支架展现自身的残疾,另外还在面前放上曾经身体健康时的照片进行对比,以及他乞讨的具体理由,不用亲身言语表述就可以获取公众的信任。而“瘫痪”这一身体状况可以说是理据性极强的说服材料。相对于图1而言,图2的身体展示更加隐晦,但同样不容忽视。该乞讨者在谈话间不断挥舞自己残疾的手指,夸张的动作让人很容易注意到,与此同时,此时的肢体展示不会引起他人的反感,反而会得到行人的信任,此时可以说是“诚信”建构的成功。因为从结果来看,只有“相信”了对方才能够进行行动(也就是施舍行为),不管她是否真实,身体的理据性作用依旧十分突出。

当然,身体的理据性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进行伪装,例如通过担架、轮椅等道具“塑造”出一个瘫痪的形象,但是毫无疑问,这些情况也可以建构“诚信”的观感。正如前面所说,是否真实不在此次讨论范围之内,真知与诚信在上述理据性极高的文本中得以凸显。也就是说,不论事实如何,只要文本为第三人建构了“诚信”的观感,便可以更好地佐证本部分的观点。

不仅是在沿街乞讨的文本中是如此,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也一定程度上遵循这种原则。如上课或工作请假一般需要病历佐证,但最为明确也是最为“诚信”的方式还是将自己病处展现给老师或领导,以此获得对方的信任。虽然身体客观的自治性条件具有的诚信建构效果更强,但在没有上述先在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动作的夸张化呈现进行有意的“标出”行为,同样也能一定程度上提高诚信的可能,这在后文的论述中会进一步印证。

三、强化身体卷入,提高理据性

除了标出理据性之外,其他不那么强的理据性,也可以通过身体卷入的强化获得上升,从而建构诚信。“身体卷入”,但是从字面意思来看,这个概念指的是一种身体在传播过程中的客观的自治性的“进入”过程,此时的身体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实体,而是一个传播中的工具。戈夫曼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用了“involvement”这个词。不过戈夫曼的卷入还包括了认知和情感的卷入。^[1]可以说,身体卷入不同于身体传播的应用,而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所控的被动过程。在前面的论述中肯定了标出理据性对于诚信建构的重要性,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身体的作用。人的身体中的理据性有强有弱,例如肢体的自然呈现就比动作更具有理据性,而动作又比表情具有理据性。在同一层面下,不同的动作也会造成诚信建构效果的不同,这是由身体卷入的程度决定的。在沿街乞讨的过程中,是双手合十,还是磕头跪拜产生的诚信程度更高?通过对于图3这一则新闻的分析,可以很好地引入这个论点。



图3 手写的便条(图源自网络)

新闻原文:2016年5月13日,遂宁一名交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违停轿车,前挡风玻璃放了张手写的纸条:“上楼接病人,耽搁10分钟,请勿抄牌,谢谢!”违停原因真如留言所说吗?交警并未立即开罚单,而是原地等待8分钟后,看见车主扶着病人过来了,默默离开,没有抄牌。

[1]戈夫曼·欧文.公共场所的行为:聚会的社会组织[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6.

[2]罗小单.遂宁违章停车留便条“停10分钟接病人”交警等8分钟见属实不予处罚[EB/OL].四川在线:<https://sichuan.scol.com.cn/xnxw/201605/54553694.html>.

这则新闻,可以看出身体卷入程度对于诚信建构的重要性。另有一则新闻,也是类似的事件,司机为交警留下便条期望交警能够不予处罚,只不过便条使用的是打印的形式,却获得了交警毫不留情的罚单。表面上看,二者仅仅只有形式上的区别,结果却大相径庭,其原因难道真就如此简单?以上两个事件,或许本质上并无差别,均是为了避免受到处罚而进行的说服行为,但是结果不同,笔者深究其原因,得出结论:手写者是通过身体卷入的加强,强化了理据性的说服效果。手写和打印的便条毫无疑问都有身体卷入的参与,在这一点上二者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说服效果的不同表明其中定然存在区别。具体而言,手写便条展示了当事人的慌忙和迫不得已,由于身体卷入的程度更高,理据性得以凸显,给人的感觉也就更加诚信;而打印便条虽然也是身体做出的行为,但是由于其在单个文本中的卷入程度不足,理据性不足,造成了其诚信建构的失败。“身体卷入程度”这一概念,指的是在理据性同等层级的前提下身体运用的程度,此处引入这个概念,也是为了在单个文本中更加深入地探讨诚信的建构方式。手写和打印同样进行了身体卷入,但是究其不同之处,就在于手写的身体卷入程度更高,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比较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不能说打印便条相对于手写便条而言更“不真实”,但是就其诚信程度比较,手写便条的诚信程度经过实践证明显然比打印便条更高。身体卷入程度的问题,当然不仅局限于手写或打印,通过沿街乞讨的文本调研,身体卷入程度在其中产生的作用能够有一个更为明确的对比。

对于肢体情况完全相同的两个文本(无明显残疾、身体问题),单从动作展现来看,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诚信体验。在成都春熙路的沿街乞讨文本(图4)中,该乞讨者衣着简陋、发丝凌乱,长久地跪在人口密集的路边,这种动作行为以及外观表现都让人心生信任,再加上其低微谦卑的姿态,收到施舍之后不断磕头表示谢意,可以基本上认同她是“诚信”的,从而进行施舍。反观文

殊院的沿街乞讨者(图5),其多是通过双手合十、仰头絮语来展现自己的祈求之意,然而就前文所说,双手合十这一动作的“身体卷入程度”远远不及磕头致谢,尽管图4图5均为跪地的姿态,但是二者的诚信程度因为身体卷入程度的不同也有着明显的区别。以结果来说,图5的乞讨者诚信程度更低,这可以从行人对于其的冷漠态度中得以体现,而图4不管从行人的态度还是施舍行为,都有较好的结果,这也展现出理据性相似的前提下,身体卷入程度高的文本建构的诚信程度更高。



图4 春熙路的乞讨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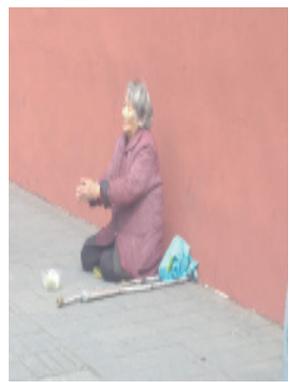


图5 文殊院的乞讨老人

米德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符号互动来完成,符号的互动对人际传播体系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又会对社会总体产生反作用力。在符号互动产生之前,最为基础也是最先出现的交流方式是利用“姿态”进行的交流。在米德的观点中,如果将姿态视为社会行动的一部分,那么它就能在同一社会行动中,作为引起另一形式(姿态)的刺激,从而在彼此之间产生行为协调的沟通过程。^[1]“姿态”在本文中可以引申其意义至沿街乞讨的动作展现之中,事实上,动作与姿态一样,蕴含着发出者一定的意图和意识,这种意图被接收者所察觉就是“理据性”通过身体增强的体现。

近年来,“场景理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顾名思义,场景理论(The Theory Of Scenes)就是关于“场景”的理论。但不同领域,对“场

[1]米德·赫伯特·乔治·霍桂桓. 心灵、自我和社会[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76-78.

景”也有着不同的界定。简单来说,场景即场面,它包括物质环境、社会氛围、人的活动、社会事实,场景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一种社会景观,它是设施、组织、机构、活动等的总成。^[1]正因为场景包含如此众多的因素,动作在不同文本中的作用也有着不可确定性,例如,图4中的乞讨者和图6中的乞讨者一样都有无声哭泣的表情,但是由于图4是在人流量较大的市中心购物区,由于受众基数大,虽然肢体等理据性不足,但这种动作表情依旧能够引起更多受众的关注;而图6的乞讨行为是在庙会期间,具有相当的时效性和特殊性,所以虽然其身体展演的理据性不足,但还是造成了行人的施舍行为。人际交往中,身体的作用也毋庸置疑,例如交谈时通过挥舞手臂、做出手势佐证自己的观点,也可以说是提高身体卷入的程度,从而建构诚信。若单纯考虑单个文本的诚信程度而忽视过多的场景要素,理据性必然是最为突出的表现重点,然而根据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只要有“观众”在场,个人的行为必然就是“表演”的行为,理据性无法纯粹地单独存在。超越出沿街乞讨的文本,生活中那么如何处理展演与理据性之间的关系?这便是下文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四、弱化身体展演,扩展诚信解读空间

理据性与展演之间有张力关系,有时候根据文本需要降低身体卷入,强化理据性。赵毅衡提出了所谓文本的“融贯性理论”(coherence theory),他指出,真实性主要来自对文本的融贯性认定。这意思是说,人判断真实性的标准之一,是文本中各元素的相互一致:逻辑上相关,各元素相互支持。^[2]理据性的展演同样需要遵循文本的融贯性原则,在沿街乞讨的过程中,是痛哭流涕好,还是面无表情好?是喋喋不休好,还是沉默不语好?在展演和理据产生冲突时,必然需要弱化展演部分以强调理据性,而有时展演也是

突出理据性存在的手段,这也符合文本融贯的需求。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突出了语言符号在交往中的重要性,他指出语言是构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桥梁,人际交流中离不开语言的作用。^[3]但笔者通过文本分析得出的结论却与之存在一定差异,在沿街乞讨的文本调查中,笔者发现有时弱化展演部分如语言、表情比起展现二者具有更加有效的说服效果。

在信息高度爆炸的今天,人们被淹没在无数杂乱的信息之中,过多的信息难以顺利到达接收者端,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找到身体建构诚信的有效方法,而理据性的展出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此时的展演并非是全然的虚假,事实上,动作的展示本身就是一种“展演”。虽然本文强调理据性的身体卷入作用,但是展演的必要性却不容忽视,只是应当通过突出理据性来弱化展演的成分,才能够顺利建构诚信。调研中,图6左边的中年女子,虽然跪在地上,身侧摆放着一些证明材料(残疾证明、照片、乞讨文字等),但她表情夸张,声泪俱下,并且一直保持这个状态,这就将其展演的一面过分突出,但并未拿出理据性的材料,文本融贯性不足,从而也无法让人相信她确实是诚信的。后来其残疾证明等材料被警方曝出是伪造的,也就证明了她确实是作假。单从文本本身来看,展演过于强烈以致文本本身不再融贯,对于行人而言,难以树立诚信的观感也是必然。反观图6右边的乞讨者,面无表情,弱化了其展演部分,反倒能够突出其他的方面,会让人产生探究其理据性的欲望,当然在此文本中理据性的部分不足,导致总体而言该文本被行人判定为“不诚信”。但是与图左的女子相比,右侧的男子显然看起来更加“诚信”。

身体表意和身体展演之间,需要保持融贯性。通常情况下,由于表情、语言的自洽性较低,其展演成分相对来说更为突出,这要求身体卷入的难度就更大,文本很难自我融贯。这也是戈夫

[1]赵建国. 身体在场与不在场的传播意义[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5(8):58-62.

[2]赵毅衡. 文本内真实性:一个符号表意原则[J]. 江海学刊, 2015(6):22-28.

[3]哈贝马斯·尤尔根. 交往行为理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95.

曼所讨论的流露和给予之间的连贯的问题。若两者不连贯,就会导致表意诚信失效。而要构建诚信,正如上文所讨论,很重要的途径是降低身体卷入,减少展演,呈现身体自然表意。

这与之前的论述并无矛盾,由于理据性的难度更大,其虚假性(或者说不诚信感)的表现就更加突出,作为普通人,演技未经过专业训练的前提下,如果在乞讨过程中一直哭泣,虽然这是对于身体卷入的凸显,但是却无法给予旁观者以真实的感情,因而,并非身体卷入程度越高就越诚信,这又回到了一开始提出的理据性如何凸显的问题。在文本本身理据性较强的情况下,身体卷入的程度与诚信的程度成正比,这是上文已成功论证的;但在动作展演程度更强的情况下,身体卷入的问题并不能仅仅停留在程度的高低上,而应考虑到文本的融贯性,也就是是否符合当前的场景。

例如在《创造101》节目中,参与节目选手的杨超越在镜头前嚎啕大哭的行为,无疑是一种展演表现极强的动作,不论其背后的意图如何,在这一单个文本中,由于这一行为本身就带有表演性质,也就自然要求她需要足够充足的理据材料进行支撑,因而当观众察觉到她可能是“装哭”之后,其诚信建构就随之崩塌,这也是必然产生的结果。在文殊院的调研文本(图5)中,乞讨者不断通过叙述企图让行人相信自己,话里话外凸显自己的悲惨,但是这种表现与她自身“乞丐”的形象完全不符,换句话说,就是文本融贯性缺场。正如戈夫曼所言,现在社会中已经很少出现某个半裸的男人被块肮脏的面包噎得喘不过气来,他们似乎是因为害羞而不开口乞讨,只是用怯怯的眼神期待行人的施舍,而这其实是对于乞丐这个“角色”的更为合理的表演。^[1]

乞丐:耳朵都打得听不见了…(中间听不清,嘟囔了几句)…多几包,多几包,本来在家里好好地嘛,嘭!那个炸弹就炸得房子塌落,那个边边

上,全部炸得炸弹,挖了好多尺了,药弹嘛,日本的药弹,把我的脑壳打了个大包包。

采访:哦是那个日本的……?

乞丐:(干嚎)耳朵都听不到咯,所以说耳朵就炸废了,就听不到了。眼睛也废了,瞎起了。这一卦都晓得我,派出所,这一片地区都晓得我的,我拿这个到你们看,你们就晓得。(掏出公交卡)你们就晓得我在哪家派出所,好难过,走了80多家了,莫得办法,我就服低保,低保不得行,我就出来,撤了,房子都撤了,莫得办法,我就跪这,天天,么得办法……

采访:(还公交卡)哦……

乞丐:(伸手来接)我莫得办法……莫得哦。

从上述采访记录中可以看出,该乞讨者的叙述与其行为之间存在矛盾,在其叙述中说明了失明状况,但当研究者递还公交卡时她却自然地伸手来接。此时的矛盾代表了文本的融贯性的缺失,这也使她通过讲述“建构”的诚信崩塌,两厢比较之下,不如保持沉默能够给予受众更多诚信的体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正因为她无法通过理据性更强的肢体展现自身的真实,只能通过言语和表情、动作等展演性表现支撑自身的角色,这是一种未成功凸显理据性的体现,也是诚信建构失败的表现。

为使文本融贯,有意弱化展演部分的同时,自然也就强化了理据性的一面,这种行为可以通过自我意识建构新的“空符号”。空符号定义为“以空白、间隔、停顿、距离等作为符号形式,在各种符号系统中起着不可替代作用的一类特殊符号”。^[2]空符号之“空”,并不代表其不携带意义,相反,其意义由于符号的空白而达到了极端广泛的程度,日常交流中的“欲言又止”、“欲语还休”等就是丰富含义的表现,人们接收到“空”这一讯息,并不是就此打住,而是会情不自禁地思考:为什么沉默?有什么不能说的?没说的是什么?从而自行为发出者“解释”其背后的内涵。乞讨

[1]戈夫曼·欧文.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34.

[2]韦世林、肖丽莉. "空符号blank-sign"在人际交往中的价值再探[J]. 昆明学院学报, 2011, 33:1.

者表情或语言的“空符号”的出现,其目的并不是不表达意义,而是对于展演部分的隐藏,从而反过来凸显自身的理据性。

这也很好理解,在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对于自身角色的塑造不一定非得通过语言符号,对于沿街乞讨者来说,如今社会对于乞丐已经存有一定的先在印象,如果通过肢体展示足以获得信任,那么再加上语言的叙述或表情的展演反而多此一举。此处的无声和空白是自我意图的“隐藏”,在之前通过展示理据性的一面获取一定的关注以后,有意识地进行“留白”处理,反而让人无法怀疑其中的真实性。人际交往中,弱化展演的部分可以说是人类交往的“本能”,在别人询问难以回答的问题时,往往可以通过转移话题、缄默不语等方式使对方了解背后的意图,此时如果选择故意展演积极的一面,反而让对方不能辨明你的想法,不相信文本的诚信,以致造成双方都不想看到的结果。

五、总结

诚信是人际沟通的期望和信念,人际传播中的诚信则是人与人之间对某一方文本建构的信任关系。它可以从现代人对乞丐的态度中窥得一二。身体作为维系真实与诚信的纽带,其作用在如今的后真相时代得以进一步凸显。综上所述,行人对乞讨者态度的冷漠是基于一种不信任的心理,反过来讲也是对于其诚信建构失败的回应。这从侧面反映了诚信的身体建构是面对现代社会的危机的有效办法。在现代社会,随着“后真相时代”这个概念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人际之

间的信任关系已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人际交往中,诚信不仅影响人们短期的心理和交往行为,而且会影响在未来社会信任的情况以及人们的判断。总之,人际传播中,身体的表达揭示了传播的规律,传播学研究的身体转向或者回归成为必然。

故笔者提出“理据回旋”理论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身体在其中的作用,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思路。用一句话总结理论内容,就是:通过展示、凸显理据性的一面,形成自我意识的标出,强调身体卷入的程度,隐藏展演的一面,从而螺旋式地建构诚信的观感。“回旋”指身体建构诚信的过程不是单向或者不可回往的,而是在文本表现中形成的循环往复、不断叠加意义的过程,诚信在文本中的建构可通过“理据回旋”视角进一步研究。

但是,不得不提及的一点是,该理论仅适用于际际交往中,其原因在于:其他形式的人际交往(如亲际交往、友际交往等)过程往往有着更加复杂的影响因素,包括性格、利益以及亲疏等,利用理据回旋带来的诚信建构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需要更加丰富的研究材料予以证明。另外,根据日常生活的经验等先在背景,“理据回旋”也许同样适用于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下的人际交往之中,但实证性的研究材料还不够丰富,因此在此处也无法进行论述。本文仅作为抛砖引玉之用,浅要地讨论了身体建构诚信的作用和机制,期望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促进身体问题进入更多社会学、传播学研究领域中。